

#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实践何以可能？\*

## ——基于新内生性发展视角下的案例考察

王明玉<sup>1</sup> 潘炜旻<sup>2</sup>

- (1.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山西 太原 030006；  
2.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以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正逐渐改变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乡村走向新内生性发展。新内生性发展理论是乡村发展的新指导理念，由乡村内部的行动者开展行动，经由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中层社会力量的工具手段和自下而上的创新行动等内外融合的发展方式，激活地方性活力。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以浙江省W村的智治小程序建设过程为例，考察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实践何以可能。研究发现：通过组织强化机制，基层党组织能够聚合资源，推动公共价值生产；通过技术赋能机制，能够推动村民参与的量化治理和规则重构，为村民提供标准化、规范化、可计算的平台；通过社会凝聚机制，能够调适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实践中，会出现数字悬浮、干群互动危机等困境，需要治理者进一步优化发展路径。

**关键词：**数字治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振兴；新内生性乡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180 (2025) 04-0078-16

## 一 引言

在数字社会背景下，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打破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中央层面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将“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作为指导思想之一，并相继出台《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实践带来了新形式，推动形成结合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四治融合”治理框架。

然而，乡村治理面临治理主体流失的困境。乡村少子化、老龄化以及人口空心化等结构性

\* 收稿日期：2025-04-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数字智能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形态变革研究（24&ZD292）；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课题：数字社会学的理论阐释与中国实践研究（SSKLZDKT2025007）。

**作者简介：**王明玉（1996—），女，博士，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数字社会、社会治理、乡村振兴。

潘炜旻（1992—），女，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问题，导致村庄中的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治理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乡村的原子化也使得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难以持续运作<sup>[1]</sup>，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而加剧治理困难。随着人口内生性生长空间的逐步萎缩<sup>[2]</sup>，乡村个体的抗风险能力逐渐减弱。那么，面对乡村治理困境，乡村究竟该如何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sup>①</sup>？

数字技术为重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主体结构提供了科技支撑。数字化实践并没有复原传统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结构，而是带来了一种新的形态。乡村治理共同体在参与结构和权力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在参与结构中，普通群众可以参与村中事务，村务的管理者也可以参与村中事务，参与者的来源不再局限于村籍地区；在权力结构中，普通村民可以借助技术场景获得力量<sup>[3]</sup>。数字技术能够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搭建起共同在场的空间，使得多元主体相聚在数字空间之中，以公共精神指导社会行动，共同推进乡村治理<sup>[4]</sup>，提升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sup>[5]</sup>。

本文以新内生性发展理论为研究视角，以浙江省 W 村的数字积分制小程序建设为研究对象，试图系统阐释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实践何以可能，探讨基层党组织如何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内生主体与外生主体的结合，挖掘乡村治理共同体开展数字实践的过程机制，以期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学理性支撑，推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 二 新内生性发展理论：关注乡村主体结构的新视角

在国际研究中，乡村发展理论常分为内生

性（Endogenous）发展和外生性（Exogenous）发展。内生性发展理论主张从乡村内部推动社会变革，强调了解当地情况的内部人最有能力指导他们自己的地方发展战略<sup>[6]</sup>。例如，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乡村内部基本上没有陌生人，都是熟人社会运转模式<sup>[7]</sup>，乡绅、宗族、长老统治等伦理规制构成乡村治理结构的基本图景，村民之间彼此熟悉、相互联络，这种乡村内部的地方性根基（Local Root）被视为具有内生性特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发展，全球乡村发展的资源、人口等发展要素流入城市，学者关注到乡村发展的外生性。外生性发展理论认为乡村地区在技术、文化和经济上依赖城市中心，乡村地区的主要功能是为不断扩大的城市人口提供食物<sup>[8]</sup>。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乡村发展受到外生力量驱使，乡村依附于城市，其发展逐渐走向边缘化。

内生性发展和外生性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理论张力。内生性发展理论强调“自下而上”，由乡村内部人推动乡村发展；外生性发展理论则主张“自上而下”，依靠乡村发展的外部力量推动乡村发展。然而，仅仅依赖乡村自身的内生性发展会受到人才、资源、资金等多方面的局限，甚至加剧乡村与外部的割裂；而片面强调外部力量则难以激活乡村内部发展的活力，不利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

鉴于二元分割下的内生性发展与外生性发展理论的解释力不足，学者提出新内生性（Neo-endogenous）发展理论。Lowe 等人<sup>[9]</sup>认为，这种新内生性发展路径“超越内生性和外生性模式”，其发展重点是地方区域与更广泛的政治、制度、贸易、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后来，Ray<sup>[10]</sup>从社会学视角提出新内生性（乡村）发展（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sup>①</sup>本文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取自政策意涵，指的是以乡村公共事务为载体，通过创新治理连接机制激发党建引领，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企业、社会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的主体性的协同式社会关系总和。

概念。新内生性发展从三个方面激发乡村发展的动力：第一，可以由地方内部的行动者开展行动；第二，当地方政府采取行动时，可以自上而下地激发发展活力；第三，可以从中层激活主体活力，特别是那些运用特定手段解决议程的非政府组织。简而言之，新内生性发展理论将任何区域的农村发展视为“当地层面与来自上层和与中层相互作用的多元组合”的综合结果<sup>[10]</sup>。

新内生性发展理论被视为是一种能够抓住地方发展机遇的理念<sup>[11]</sup>，将这种新内生性发展理念形象地描述为“扎根于当地，但向外看”（Locally Rooted but Outward-Looking）<sup>[12]</sup>。学者们主张新内生性发展依赖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试图强化地方潜力的外部影响，声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以及当地和外部影响之间的协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sup>[13-14]</sup>。Bock<sup>[15]</sup>则强调新内生性发展的关键影响变量是社会创新<sup>①</sup>，这是突破乡村边缘化的“灵丹妙药”。Bock 继续指出社会创新离不开乡村区域的连通性和网络化，以推动乡村获取当地的社会资源和基础设施。总而言之，新内生性发展理论已经成为欧洲地区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指导方针。其作为乡村发展的新指导理念，核心思想在于强调由乡村内部的行动者开展行动，经由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中层社会力量的工具手段和自下而上的创新行动等共同组合，融合内生和外生的发展模式，激活地方性活力。

在中国，具有新内生性发展理念的数字治理实践已然展开，但新内生性发展理论的系统研究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实践层面，有学者在总体分析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时，强调数字技术之所以能够对社会治理产生支撑作用，部分原因是社会主体之间的连通性增加，这推动了治理活动动员的开放度和

参与度<sup>[16]</sup>。在此基础上，乡村治理共同体能够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场域中，通过党支部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采用“党支部+协会+农户”的发展模式，解决治理中“上动下不动”“体制内外难互动”的难题<sup>[17]</sup>。在理论层面，有学者关注到乡村新内生性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特色的新内生发展表现在本土资源与外部资源联动、个人发展与社区发展统一、农民主体与社区单元统一，主张未来应当采取“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新内生发展模式，以此应对乡村振兴时期的内生发展困境<sup>[18-19]</sup>。也有学者关注新内生性理论对乡村振兴的启示，认为新内生性发展模式能够为城乡要素流动提供理论支撑<sup>[20]</sup>。整体而言，学界目前缺少将新内生性发展理论与中国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相结合的探索。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浙江省 W 村的数字治理实践为案例开展研究，进一步提炼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完善国际新内生性理论的内容。

### 三 案例介绍与资料分析

#### （一）案例导入：浙江省 W 村的内生向新内生的发展过程

浙江省 W 村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四周环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全村总面积 11091 亩，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约为 18%，乡村社会进入老龄化状态，乡村产业以民宿为主。W 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宗族传统，村庄中的村民多为“刘”姓，是典型的熟人式共同体。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浙江省 W 村的外来人口逐渐增多，环境治理成为突出问题。因此，浙江省 W 村拟开发智治小程序作为治理手

<sup>①</sup>在 Bock 的定义中，社会创新是指乡村社会与其生存相关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生存要素涉及社会关系、可用能力、参与集体的意愿和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

段，以积分制的量化标准引导村民参与其中，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

### 1. 浙江省 W 村的宗族基础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sup>[21]</sup>，以伦理为基础的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sup>[22]</sup>。乡村社会的宗族力量能够发挥共同体的凝聚力，提升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以及村庄公共事务的处理水平。例如，宗族可以发挥其在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的利益整合与资源整合功用，推动乡村公共事业的发展等<sup>[23]</sup>。但随着时代发展，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的宗族力量正在减弱，以血缘和地缘为连接纽带的共同体连接结构已然发生变化。不过，宗族力量并没有完全从共同体连接结构中消失，而是在正式组织功能缺失时，成为共同体寻求公共物品需求时的替代性选择。因此，在宗族与民主力量并存的村庄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绩效往往更高<sup>[24]</sup>。尤其是跨地方的宗族力量，其流动性以及对应的文化和社会经济资本能够推动乡村之间的发展<sup>[25]</sup>。

W 村具有深厚的宗族底蕴，为新内生性发展奠定了主体基础。W 村保留宗长制，宗长为刘氏后人，刘氏家族每三年会推举一名宗长，掌管家族的历史文物、负责安排重大事务。众人选举的标准是刘氏宗族之中德才兼备、影响力较大的人。当 W 村的乡村发展遇到需要宗族协助的公共事务时，村两委会去寻求宗长的帮助。因此，在 W 村，宗族力量依旧存在于乡村治理共同体之中，可以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提供乡村文化的底蕴支撑，以及乡村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支撑与互帮互助。然而，宗族力量并非像传统宗族一样局限在相应的物理空间，而是流动到共同体之外的物理空间中。目前 W 村的宗长已不在村中居住，而是在杭州市常住，印证了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内生性与外生性（时空上的“脱嵌”）力量相融合的可能性。

### 2. W 村外来人口激增带来治理难题

在 2014 年之前，W 村是一个偏远山区，发展形势不好。2017 年换届之后，村两委呈现出较大的工作活力。村干部具有发展想法，积极向镇里寻求项目支持，争取落实村庄里的各项资源发展。同时，村干部也经常与村民进行互动，了解村民想要发展的实际诉求。如一位村民曾这样评价新一届村两委：“这一届的村两委还是很靠谱的，有什么事情时会叫我们一起商量，找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很愿意去帮忙的。村里有一些什么矛盾或者要建设什么项目，他们都会去解决、去争取。”（访谈编号：20231218FYJ）2018 年之后，W 村发展势头迅猛，引入旅游业，先后获得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民俗文化村等。

然而，村落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外来人口激增、环境破坏等乡村治理问题。传统的人力结构难以解决村庄发展面临的乡村治理难题。游客随手乱丢的垃圾飘落到街面上、荷塘里，导致村庄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引入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引入积分制主要针对的是环境卫生、垃圾分类。因为我们村是旅游村，每年游客遗留下来的垃圾真的很多，像河道里的矿泉水瓶啊，只要村民肯从那里把它拿出来，投放在我们专门收集垃圾的箱子里面，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积分，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我们环卫工人的压力。”（访谈编号：20230118LJY）

2021 年之后，正值浙江省推动数字化改革之际，该村引入积分智治系统和未来乡村数字大脑。积分制经历了从线下转换至线上的过程，从垃圾分类的积分制扩大到复合性乡村治理的“数字积分制”，通过将村民活动量化与数字化，实现村民参与的数据化储存。村民主体可以将有关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的问题发送至小程序端口，并通过数字程序解决问题。

整体上，浙江省 W 村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数字乡村蓝图乃至乡村振兴图景中具有典型性的

缩影：一是具有乡村宗族底蕴，拥有熟人社会基础；二是融入新兴技术形式，催生量化的利益连接纽带。这两个特征的融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乡村治理共同体之中的情感与理性张力，挖掘新内生性发展在实现价值聚合上的黏合作用。

## (二) 资料来源与分析

本文的研究方法为田野调查与数字民族志。2022年11月，笔者在学校宿舍楼以邻里互助的方式，与一位浙江温州籍的毕业生在微信群中相识。在此期间，笔者正围绕浙江省温州市的数字乡村治理情况收集二手资料。由于研究兴趣相投，两人便相约前往温州调研。2022年12月，在摸排温州市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建设情况后，发现W村的数字积分制是该市的宣传示范。前期文献调研中的初步探索与新内生性发展理论相契合，且能够展示出中国新内生性发展区别于国外新内生性发展的独特经验。因此，笔者选择W村作为本文研究的案例，随即联络在温州市的同学进入W村调研。笔者于2023年1月进入W村，开展田野调查，并顺利进入W村的数字空间（W村联谊群）中，通过数字民族志进行数据收集。

浙江省W村的数据收集累计时间为18个月（2023年1月至2024年6月）。资料类型主要分为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主要包括半结构式访谈资料、数字民族志资料、会议记录和个人调研笔记等；二手资料包括权威性公开调查数据，省市县三级政府有关数字治理、

乡村振兴等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和会议宣传稿，乡村治理相关内部规则、村规民约等，与乡村治理相关的村庄汇报稿、研究报告、宣传资料等。本研究重视案例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收集方式，通过多种渠道掌握关于村庄案例的相关数据资料。最终，作者收集到文字资料总字数12万余字，文件容量3.4GB，综合上述资料建立研究资料库。

笔者使用NVivo 14软件对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定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有助于对本文收集的文本资料进行概念编码，编码全过程分为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sup>[26]</sup>。然而，这种分级并不意味着一定按照层次顺序开展分析，前两个层次的分析虽然处在分析的前期阶段，但也可能出现在分析（接近）结束之时<sup>[27]</sup>。因此，笔者特别重视前两个层次的编码分析。

在开放性编码的过程中，笔者打开所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使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挖掘数据中的所有潜在可能性，从资料中提取概念代码。具体的操作步骤为：（1）以“新内生性”为核心议题，将相关文本资料导入NVivo 14，从头到尾通读材料，感同身受地走入参与者的生活，继而对相关规范性语句进行摘录，并按照资料类型对原始资料进行编号；（2）对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在摘录内容中提取一个词语，并将此作为代码，从而提炼出基本的分析概念；（3）进行范畴化，对初始概念标签进一步凝练，继而形成分析范畴。编码过程示例可见表1。

表1 开放性编码表

编号	资料摘录	初始概念标签	初始范畴
A001	有些数字化的东西要落地，光靠村里的这些人去搞，他们搞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引进了第三方物业公司。	外来力量	引入新力量
A002	小程序是一种新兴的事物，需要有新的年轻人进来，我们换届的时候重视那些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在本地企业工作的人，把他们吸收到我们的队伍里。	重视年轻人	人才发掘

表 1 开放性编码表（续表）

编号	资料摘录	初始概念标签	初始范畴
A003	我在外面是能看见群里的消息的，要是群里说了积分更新了，我就再打开小程序也看看，我们家啥样的，其他人啥样的。	流动人口 在外能看到	时空脱嵌
.....	.....	.....	.....
B001	（针对群里的认可度调查）点点赞，支持干部，但 XYY 是谁，没见过。	干群互动 停留在指尖	干群关系风险
C001	现在这个数字化的工具，大家还是比较喜欢使用微信或者微信群，大家能快速上手的。平常大家都在“快手”里看看，关于公共事务大家很少愿意再去打开个小程序或者 App 再去看看，所以你说这个数字平台可能还是贴近生活一些，他们用得更习惯。	技术采用的 生活化	数字悬浮
.....	.....	.....	.....

主轴编码是对初始范畴的进一步归纳分析。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分析初始范畴之间的关联，提取具有显著逻辑关系的主范畴。编码过程示例可见表 2。

表 2 主轴编码表

主范畴	初始范畴	开放式编码中的代码
组织强化	集体利益	集体经济、调动历史文化资源
	引入新力量	驻村干部、物业公司
技术赋能	量化利益	积分管理、小组打分、利益竞争
	行动量化	行动标准化
共同体再造	规则方案	人情淡漠、利益交换
	以技术为媒介 多元主体	技术端解决问题、公事公办 关系复杂

在选择性编码的阶段，通过开放性编码和主轴编码对原始资料的系统性整合与提炼，笔者基本完成对“故事线”的梳理，发现研究需要的核心理论要素，并系统性地已将已发现的理论要素与其他范畴之间建立理论关联。至此，本文的资料分析经历了多重验证过程，经验资料与资料分析的容量达到饱和，可以停止采样工作，正式进入实证研究呈现阶段。

#### 四 内外融合：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机制——基于 W 村数字治理实践的考察

在传统乡村的关系互动中，村庄内部的主体相对单一。经历乡绅、生产大队、乡村能人、

村委会等核心主体变更后，村党组织在乡村内部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由于村党组织多由村民党员组成，村庄内部的党员既是乡村的村民，又是基层党组织中的一员，是连接内外力量的有效支点，故本文将村庄的基层党组织中的党员视为内生主体。同时，将其上级组织（乡镇党组织及以上）视为外生力量。在未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之前的主体关系如图1所示。

村党组织直接与上级党组织、村民和外来人口等主体进行互动，主要表现在村党组织需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并接受上级的管理，更多的是执行功能。当外来人口进入村庄后，如果遇到问题需要第一时间到村党组织的物理空间进行处理。乡村的青年劳动力向外流动，村庄内部的群体则按照熟人式社会的互动方式进行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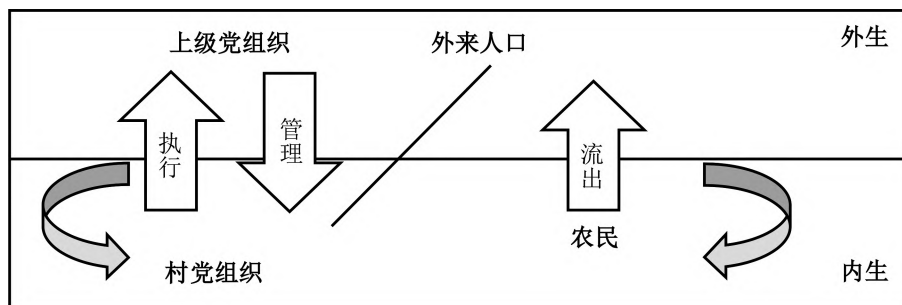


图1 浙江省W村先前的主体关系

经过乡村数字治理实践，W村正在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W村的数字治理实践是打造智治小程序，实施数字积分制。不同于微信群的“免费”形式，小程序的建设需要技术人才和经济投入，基层党组织在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上发挥着引领作用，乡村治理共同体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主体互动情况。通过数字治理实践，W村至少从三个方面构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1）组织强化机制，基层党组织聚合资源，推动公共价值生产；（2）技术赋能机制，推动村民参与的量化治理和规则重构，为村民提供标准化、规范化、可计算的平台；（3）社会凝聚机制，调适乡村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推动乡村共同体再造，走向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

#### （一）组织强化机制：资源聚合与价值生产

党建引领是中国乡村发展的独特优势。纵观百年发展史，中国共产党曾引领乡村进行制度创新与变革<sup>[28]</sup>，将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sup>[29]</sup>。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二十大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基层党

组织凝聚群众的任务日趋明显。强化党的领导，能够落实基层民主<sup>[30]</sup>，因为党不是随心所欲的“领导”，而是要支持和保障乡村自治。基层党组织能够支撑和帮助村民实现自治，使其行使村民民主权利<sup>[31]</sup>，激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部活力，提升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sup>[32]</sup>。在发展过程中，W村的“两委”班子积极向镇级争取资源，借助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引领公共价值生产。鉴于W村具有社会活力，乡镇的党支部将智治小程序放置在W村，并由组织委员设计推进。正是内部积极向外提出发展诉求，外部也向内部进行资源输送，由此奠定了乡村治理共同体数字实践的主体格局。

基层党组织推动内生资源的战略性盘活。短期的项目支撑只能使数字化建设运行，如果没有长期的集体经济支撑，再完美的技术设计也会变成“僵尸”工具。正如村书记所言：“你来之之前也都看到了，其实我们这里是没钱的啊，现在都是镇里面给钱。如果资金链断了，我

们现在做成的数字化转型的东西就都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共同讨论出来要做大做强我们的文化，发展集体经济。像我们除了做LBW文化以外，我们还在挖掘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我们现在都在跟进。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找这个历史文化的东西，我们现在做的只是恢复以前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其实我们自创的东西少得可怜，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游客体验到这里别具一格的旅游产

品。”（访谈编号：20230118LJY）首先，基层党组织试图盘活W村的村庄资源，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反哺数字治理实践，最大限度地将村庄的历史文化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的价值发挥出来。例如，W村依托历史文化名人和古迹的文化底蕴，集中优势资源，为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积累经济和文化资源，为数字技术持续运行奠定物质文化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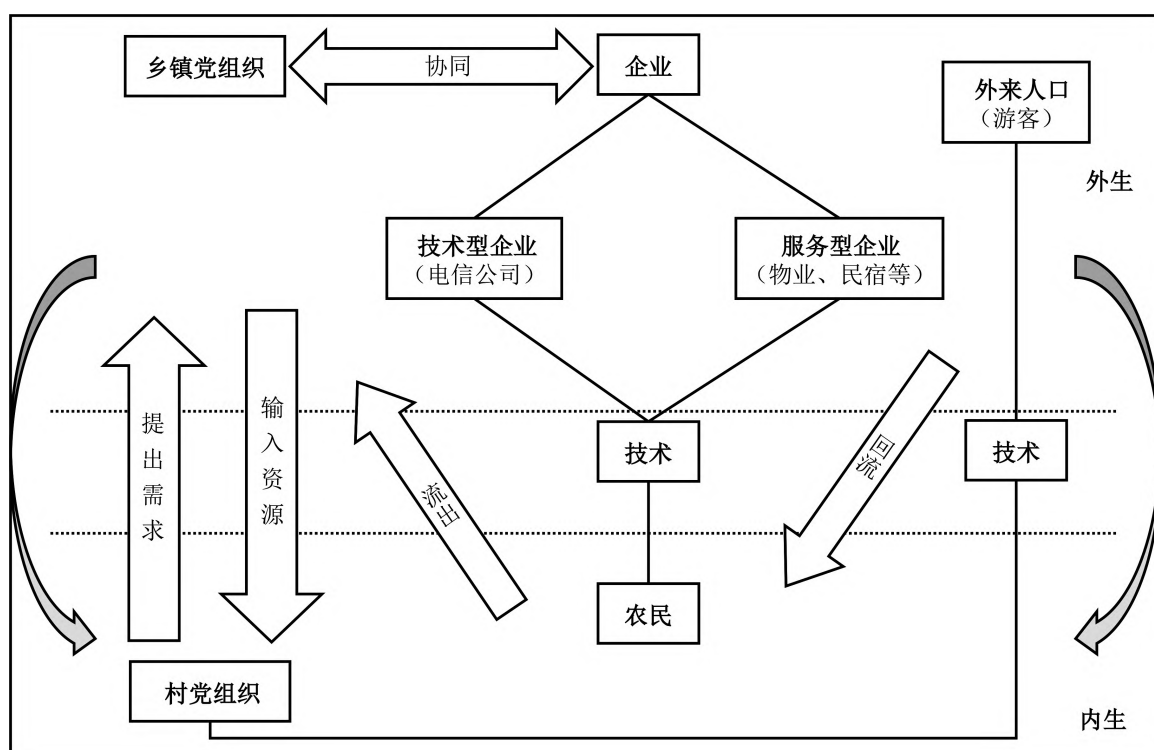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主体互动情况

基层党组织借力借势，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整合。数字时代的治理不再是单一的上级谋划或者下级的索要项目，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上下共治”的景象<sup>[33]</sup>。即上级与下级之间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的运转。当前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仅靠乡村内部的力量可能难以跟上时代思维，强硬引入外部力量又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在这种状况下，镇级党支部试图多方面引入新生力量，为乡村治理共同体寻找新型代理人，使新型代理人和村庄内部的“两委”成员

各司其职，解决乡村治理共同体缺乏数字人才的困境，助力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例如，W村引入了驻村干部和村务助理，为乡村事务注入新生力量。驻村干部的组织特性是一种混合的科层制，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源和使用新型信息技术<sup>[34]</sup>。此外，乡村治理共同体在小程序建设初期，曾引入具有相关专业背景或经历的外部主体，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项目实施运行的建设者可以运用其实践经验和创造热情连接外部的多元主体，将不同成员的利益诉求融入数字治理实践之中。

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化的利益耦合，为数字化建设提供社会活力。例如，W村引入技术代理人来推动数字实践，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提供科技支撑，这些代理人包括温州电信公司等。此外，W村还引入市场力量，提升数字乡村治理实践的专业性，这些市场力量包括物业公司等。物业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物业公司以其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管理手段，为村民创造了整洁有序的物理生活空间。另一方面，物业公司发挥市场平台的作用，为有限的乡村空间开拓了更大的市场，为双方扩大了利益基础。正如乡镇所评价的：“若想让数字化的东西能够落地，光靠村里面的这些人去搞，他们搞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引进了第三方物业公司，让物业公司对整个村庄进行托管。同时，物业也能够提供资源，因为他自己后面有很庞大的一个资源库，村里面的产品可以卖到他们服务的小区，拓宽销售渠道。”（访谈编号：20230117WSF）

综上所述，智治小程序的建设与设计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通过强化内部阵地作用，形成数字治理实践的向心力。同时，智治小程序依赖多元主体的参与，这些主体包括上级政府和社会力量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实践让乡村治理的主体格局不再局限于乡村内部，而是融合内生主体和外部力量，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积极性。

## （二）技术赋能机制：量化治理与规则重构

基层党组织以智治平台为载体，通过数字积分制重塑治理规则。具体而言，基层党支部构建智能基座，使乡村治理的规则显性化。在积分制运行之初，乡村干部主要承担评分职责。农户正确区分垃圾可得1分，折合购物券1元。但在实际运行中，村民对积分制运行提出了质疑。部分人对乡村中的熟人社会有所不满，认为乡村中的村干部打分可能会因为人情关系而出现分数不平等的情况。当熟人社会中的情感

要素遇上量化评价的理性要素时，理性的竞争评价逐渐占据上风，推动乡村的规则显性化。在过去，乡村社会多以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为治理基础，乡村治理共同体没有标准的章程，十分重视人情关系。数字积分制设立了一套精细的积分制运行流程、积分标准等，让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的每一位行动主体都有规可依，通过加分和减分的方式对行动主体形成激励与约束。乡村智治小程序成为数字积分制运行的技术载体。村民可以在小程序中看到自己与游客的积分获得情况、积分兑换情况等，即时查阅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的积分动态。同时，小程序能够及时进行情况上报和发布求助信息等，以数字技术的快速响应优势推动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问题。智治小程序通过积分形式促进村民形成对乡村的公共意识，提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技术赋能推动形成互帮互助的文化。积分制是一种将社会行动量化为数字的制度，可以根据村庄发展实际与发展目标，灵活修订积分制规则和方案，从而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自治行动提供精细化、透明化、规范化的参考标准。村两委成员根据村庄自身特色，将数字积分制的内容从垃圾分类扩展到其他诸多内容，将积分制细则公布在村庄的告示栏中，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推动数字积分制的形成与落地。村民可以通过数字积分制的量化标准，引导自身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发挥自己的主人翁意识。正如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村民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有较强的积极性：“我们经常可以在群里啊、小程序里啊给村里面提意见的。同时，他们过来有些事情跟我们商量的话，只要是对村里发展有好处的，对这些环境没什么污染的，这些东西我们是配合的、支持的。但是如果是本身没有什么发展，或者对环境造成破坏了，这些我们肯定要持反对意见或者保留意见。”（访谈编号：20230118DFT）此外，数字积分制还可以通过积分制将村民的社会行为与个人利

益或个人兴趣相结合，引导村民积极向善，促进乡村文明建设，重建乡村道德共同体：“比如，我们有邻里互助的积分，这能够传承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就是有村民说我今天有事情不方便去接送孩子，或者不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那他就可以在平台上发布需求，就说我今天下午哪个时间段可能需要有人帮我接送孩子或者照顾老人。如果我下午有空我就可以帮个忙，帮忙结束之后就会获得积分这样子。为了防止村民之间互刷分数呢，作为提出需求的人，我是要付出相应的积分的，然后平台补助给参与帮助的人。”（访谈编号：20230116XHY）

数字积分制强化“家户”观念，跨越时空边界，撬动个体与集体的连接。家庭行动是重要的伦理关系，一家人会为了一个家庭的前途而共同努力，“家和万事兴”等耳熟能详的谚语流传至今<sup>[35]</sup>。数字积分制能够突破原有积分制的时空限制，加强家庭观念与家庭联结，增强在外村民对村庄事务的感知度。例如某村干部所言：“2021年，我们把积分放到了线上来。我们打造出的线上空间也方便。像有些人常年在外，他们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打开，因为我们是户为单位的，你可能一户里面有好几个人，你在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家里这一户有多少积分。”（访谈编号：20230120ZDE）这表明，在家户中引入量化的竞争方式，能够激发个体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数字积分制是当前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试点。数字积分制以量化行为管理公共事务，通过积分奖励形式提升家户的利益认知，利用利益竞争机制推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实践，实现乡村治理的发展目标。同时，数字积分制扩大了积分制的可用范围与人群，将更多群体纳入乡村治理共同体中，不仅使村民能够积极参与村中的事务，而且使多元主体（如游客）都能通过智治系统将其有助于村庄发展的建议传递给村庄。这也说明，乡村治理

共同体正在从依靠传统人情关系的参与逐渐转化为依靠成本收益核算的选择式参与<sup>[36]</sup>。

### （三）社会凝聚机制：技术嵌入与共同体再造

智治小程序将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共同体中。嵌入性理论的提出者波兰尼<sup>[37]</sup>认为，经济行为并没有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而是紧密地与社会结构相连，由此使得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等都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格兰诺维特<sup>[38]</sup>认为人际互动是社会过程的嵌入，人际互动中的信任关系成为影响经济行为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嵌入性理论既承认行动者的主观性，又强调个体行为会受到社会结构影响<sup>[39]</sup>。同样地，技术嵌入的过程也承认了行动者能够使用技术为社会结构赋能，同时行动者也接受着技术的影响<sup>[40]</sup>。技术是推动政府有效回应复杂社会问题的重要技术工具<sup>[41]</sup>。在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中，技术嵌入增加了乡村治理不同主体间的互动频率和强度，帮助各主体适应乡村治理共同体运转的社会结构，通过多重资源耦合的方式公开化、透明化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信息。数字平台能够通过信息共享、公示及上报问题、解决问题等方式，基于透明性和回应性来实现信任重建<sup>[42]</sup>。

技术嵌入为多元主体参与提供平台渠道，有助于信息公开。浙江省W村的智治小程序记载着村庄的各项信息，包括财务信息、人员调动信息等：“我们这个小程序放了村里面的信息公开内容。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如果你想了解村庄里的公共事务，通过小程序都能看到。”（访谈编号：20230116ZDE）不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成员是否身处在村庄的物理空间中，都可以通过小程序的公开界面了解到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内容。同时，小程序的界面也会展现积分的变动，在数字界面上滚动播放每个人的积分排名和积分获取情况。这种技术嵌入形式通过提高村民对村庄信息的知情权和感知度，提升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将涉及村民的利益诉求拿到“明面儿”上来谈，对于乡

村治理共同体而言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们可以以更加理性的方式谈论个体利益，向集体争取和谈判个人权益，以公开的方式让共同体成员共同见证。另一方面，村民都会为个人利益开展行动，从而在集体行动中共同促进集体目标的实现，减少“搭便车”现象。然而，这种数字化工具的利益体现的是一种正式组织或者管理层面的利益，而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的关注较少<sup>[43]</sup>。

对比图1与图2能够发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结构。技术嵌入淡化了传统乡村共同体的物理区隔，将共同体成员凝聚在线上 and 线下空间。基层党组织通过政治协同的方式，将企业等外生的主体吸纳到数字乡村建设中。不仅如此，外来人口（如游客）也能够通过乡村空间中的“二维码”了解乡村公共事务，并建言献策。在技术嵌入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并非由单一的元素构成，而是一个复杂多元、有生命力的共同体，在动态的环境中成为乡村振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五 新内生性发展视角下乡村治理共同体数字实践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存在数字悬浮的困境。数字悬浮是指乡村治理共同体在使用数字技术时未能贴合村民生活的实际需要，从而使得技术悬浮、无法得到合理利用。数字悬浮是基层治理中的一种异化现象<sup>[44]</sup>，不仅存在于城市治理共同体之中<sup>[45]</sup>，也存在于乡村治理共同体之中<sup>[46]</sup>。W村的数字积分制理念超前，与城市接轨。这使得W村在智治小程序落地的过程中，存在个体应用的数字鸿沟问题，表现出数字悬浮的困境。例如，笔者在田野期间的访谈对象曾言：“我的手机就是老年机呀，我平常也不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就在屋里面待着。他们发给我

的东西我也不会用，垃圾直接放在门口物业会收走，生活都比较方便，其他的我都不参与，不会用也不想参与了。”（访谈编号：20230120LTY）这种资源浪费的情况在乡村屡见不鲜。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实践构想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精细化、精准化管理，在服务老年人时对孤寡老人的真实生活予以实时把握。但是，在调研期间，笔者发现W村针对孤寡老人发放17个智能手环，仅有3个手环保持有电的状态，设备在线率仅为17.6%。在应急响应方面，智慧手环虽有报警功能，但尚未开通即时信息接收。而且，报警系统端口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指挥电脑中，只有在电脑前才能够收到报警的信息，这导致智能手环失去了报警的本质意义。

在量化实践的场域中，村民实际参与的意愿和效果不佳。在与村党支部副书记的访谈中，他直言不讳地表示，目前数字乡村治理的使用效果看到的都是“面子”。在实际应用中，人们看到的“面子”是借助数字工具和系统来进行垃圾分类治理，真正想要做到的“里子”应该是人们主动使用数字化的治理工具来达到乡村治理的效果。“什么方法才是最管用的？现实是村民还是喜欢直接打电话、挨家挨户的走访。”（访谈编号：20230803JSJ）若想真正解决数字悬浮问题，让数字工具落地管用，笔者认为村书记提到的三个必要条件颇具参考性。首先是领导认可。领导的重视和认可，能够推动数字工具的宣传和扩散，使更多的人知晓工具，扩大数字工具的群众基础。其次是干部减负。技术“赋能”一直有转向“负能”的风险，即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面临“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行政压力，乡村干部的大部分精力被报表和清单牵制，数字工具不仅没有简化行政负担，还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考核内容。最后是村民易用。数字工具如果能够使人们遇到问题时第一时间想到它，那么其渗透效果就能真正落地，这离不开数字治理工具的

可接受性程度以及技术的可用性、易用性、兼容性、相对优势和使用者的自我效能等。

乡村治理共同体可能陷入干群关系危机。在传统乡村中，透明性和回应性不足是其普遍存在的问题。实施数字治理后，数字平台能够通过信息共享、公示及上报问题、解决问题等方式，基于透明性和回应性来实现干群关系的信任重建<sup>[42]</sup>。这种技术嵌入带来的积极影响值得肯定，例如，有研究指出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增强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sup>[47]</sup>。但是，数字技术对社会关系的影响，需要根据具体场景加以探讨。虽然浙江省W村的小程序为维护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技术手段，但也增加了人们对监测环境运行技术的控制难度。一方面，W村的生活环境正在走向熟人社会的陌生化，过去以宗族力量为纽带的社会团结支柱逐渐被冲淡。虽然数字技术增加了人与人之间在场与缺场的连接性，但也使用户变得“忙碌”<sup>[48]</sup>，减少了建立在场情感关系的可能性。在过去，技术介入的方式是以电话形式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负责人。如今，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成员发现问题时，可以直接通过技术嵌入的平台反馈问题。相关负责人则通过技术端接收上报的问题信息，下发任务清单让其他负责人解决相应问题。这一定程度上使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成员更加依赖技术来解决问题，而忽略了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的“人”本身。长此以往，在这种互动机制下，人们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时更加选择技术、依赖技术，乡村治理共同体之间商量的空间日益流失，更多采取“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公示结果”的流程，更多依靠技术嵌入来连接共同体成员，由此导致人与人的情感要素退居后台。透过村民的讲述，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变化：“以前要去公告栏才能看到的東西，我现在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得到嘞，还是挺方便的。但是有时候也成依赖了。一般有什么问题在网上说就好了，点上去

就上传了，也不用对着人了，还能获得积分。我觉得省了很多事儿，但是和村干部确实也就不太联系了，以前互动好像多一点，现在网上交流多一些。”（访谈编号：20230118DFT）另一方面，技术嵌入会带来不确定性。W村中布置了大量数字监控摄像头和传感器，虽然能够捕捉到村庄中流动人口的动态情况，却很难保证数字技术运转的安全性，而且尚未公开其对数据的分析解释能力以及数据保护能力。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面向的村民基本是文化程度低、数字素养弱的农民群体，他们能够看到简单的信息共享，但并不意味着其也能够看到深度的数据使用。他们尚未意识到自身的信息数据和身体数据在村庄中被实时采集，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或利用自身形成的各项数据。当村民的数据意识被唤醒，数据使用的知情权和使用权将是绕不开的问题。

除此之外，由于技术嵌入引入了外来社会力量，村民在村庄中的主体性逐渐被削弱。笔者在浙江省W村的调研发现，物业作为一种新兴力量进入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物业人员会定期到乡村“检查”村庄的环境卫生和村容村貌。在过去，村民可以自由“占据”乡村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晾晒被子是村民作为村庄主体的自主性。但是，物业的引入使得村民从村庄“主人”变为“客人”，村民的晒被子行为会被“晒”到数字空间中并受到其他村民的凝视，村民调整生活习惯的行为成为物业人员口中的“谢谢配合”。如此一来，村民在村庄中的地位因数字技术的引入及主体范围扩大而被削弱，新型矛盾冲突由此萌芽。

技术嵌入影响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团结水平。在数字技术没有应用之前，村干部处理公共事务需要通过上门走访的形式实现，在处理问题时可以通过“面子”解决。村干部走访频率的增加使得干群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增加了双方的日常生活互动。然而，数字技术进

人之后，村干部与村民的信息传达可以借助数字工具实现，双方面对面的机会逐渐减少，这会削弱干群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情感关系，使干群之间出现“无连接”状态。在对某个村干部的访谈即将结束之际，她坦言：“就像咱以前大家还是熟人，互相还是给点面子的，因为像我们做了二十几年村干部了，以前我们做工作一般去讲的话我都能讲得通的，他们就会说好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走动很多，跟老百姓每天都见面的，反正每天都走下去的，所以你再讲什么的时候也好说。但是你现在其实下村走动的（频率）要少。因为啥？填表的东西多了，开会的东西多了，接触群众的机会也少了，有东西就在群里能发就发了，走村入户走得要少了。”（访谈编号：20240313GBH）

基于上述乡村治理共同体数字实践面临的困境，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善。

第一，加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共同体的信息连接能力。加快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制定符合地方共同体特色的新内生性发展政策，提升新内生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服务质量。强化乡村治理共同体新内生性发展的软件信息基础，构建符合乡村治理共同体需求的信息一体化平台，提升村民对乡村治理共同体及其相关政策进展的了解等。以户为单位，确保家户进入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场域，避免乡村治理共同体出现社会排斥与数字排斥双重困境。加强数字包容建设，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开展再社会化教育，加大对村庄常住人口（尤其是老年人群体）使用数字化工具的宣传与培训力度。重视优化数字素养的结构性差异，如关注女性和老年人等数字素养结构中的弱势群体<sup>[49]</sup>。

第二，重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组织行为建设，提升共同体的利益聚合能力。乡村治理共同体展现出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多方利益需求不尽相同。数字治理的源头治理

需要从内部寻找方案，因此要加强党建引领，提升干部群体的思维与能力。发挥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内生性理念在多元主体和资源联动上的优势，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构建有温度的乡村治理评价体系，引入定性的评价方式，综合发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作用。

第三，培育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社会力量，保障共同体的资源运转能力。优化符合乡村实际的村规民约，保证集体行动的底层逻辑和基本方向。落实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活需求与诉求，增加乡村治理共同体之间的互动频率，在走访与交流中提高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信任程度，加大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关系网络构建力度。此外，人才是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所在，要建立多元化的人才体系。即从内生角度出发重视挖掘本村具有数字素养的多元群体，从外生角度出发引进对村落发展感兴趣的知识群体，多措并举优化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人才培养路径。

## 六 结 语

新内生性发展理论是乡村发展的新指导理念，强调由乡村内部的行动者开展行动，经由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中层社会力量的工具手段和自下而上的创新行动等共同组合，融合内生和外生的发展模式，激活地方性活力。在浙江省W村的数字实践中，乡镇党组织结合未来乡村建设方向，自上而下地向W村输入资源，例如投入项目经费、联系企业（技术公司和物业公司）等，保障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层的技术媒介作为一种工具，嵌入乡村治理共同体中，连接企业、外来游客等多元社会主体，淡化传统乡村共同体的物理区隔，将内部主体与外部主体相融合。村党组织为解决环境治理难题，自下而上地提出数字积分制构想，

并付诸实践。

本文的案例研究补充了新内生性的国际理论。国际上的新内生性理论为乡村转型提供了新指导理念，但该理论在实践中缺少带动发展的核心主体。该理论强调了共同体的重要性，但共同体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存在具体落实时发力不足的问题<sup>[13]</sup>。在中国的实践中，党建引领补充了新内生性理论的主体内容。基层党组织能够成为内外融合的关键节点，通过构建资源网络，推动乡村振兴向实、向好发展。经过对图2的考察能够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振兴从“农民”在场<sup>[50]</sup>走向“人”的在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农民”在场，而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平台属性，推动多元主体借助一个共同的“物质”来打造共同体，打造“人”的在场，这里的“人”既包括农民，也包括多元化的主体。未来研究应当进一步剖析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研究中人的主体性问题，通过新内生性的理论启示，挖掘乡村中的多元主体作用，持续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学理性支撑。（致谢：感谢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叶宇舟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文责自负。）

#### 【参考文献】

- [1] 杨风云, 马中红. 作为媒介的社会组织对乡村生活共同体建构的影响——基于苏州市M村的个案研究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4 (3): 43-58.
- [2] 董运生, 张立瑶. 内生性与外生性: 乡村社会秩序的疏离与重构 [J]. 学海, 2018 (4): 101-107.
- [3] 邱泽奇, 李由君, 徐婉婷. 数字化与乡村治理结构变迁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 74-84.
- [4] 张成岗, 王明玉.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行动逻辑及推进路径——以吉林省X村为例 [J]. 行政管理改革, 2022 (9): 21-30.
- [5] 赵祥云, 赵晓峰, 王春凯. 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社会治理效能感? ——基于全国11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电子政务, 2024 (2): 113-124.
- [6] EVERSOLE R, CAMPBELL P. Building the Plane in the Air: Articulating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Ground Up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3, 101: 103043.
-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7.
- [8] GKARTZIOS M, SCOTT M. Placing Housing in Rural Development: Exogenous, Endogenous and Neo-endogenous Approaches [J]. Sociologia Ruralis, 2014, 54 (3): 241-265.
- [9] LOWE P, MURDOCH J, WARD N. Networks in Rural Development: Beyond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Models [M] //VAN DER PLOEG J D, DIJK G. Beyond Modernization: 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ssen: Van Gorcum, 1995: 87-105.
- [10] RAY C. Culture Economies: A Perspective on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M]. Newcastle: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2020: 9.
- [11] WARD N, ATTERTON J, KIM T-Y, et al. Universities,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M]. Newcastle: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2005: 2.
- [12] GKARTZIOS M, LOWE P. Revisiting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M] //SCOTT M, GALLEN N, GKARTZIOS M.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Rural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2019: 159-169.
- [13] BOSWORTH G, ANNIBAL I, CARROLL T, et al. Empowering Local Action through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LEADER in England [J]. Sociologia Ruralis, 2016, 56 (3): 427-449.
- [14] BOSWORTH G, PRICE L, HAKULINEN V, et al. Rural Social Innovation and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M] //CEJUDO E, NAVARRO F.

-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Rural Areas: Results and Lesson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0: 21-32.
- [15] BOCK B B. Rural Marginalisation and the Role of Social Innovation; A Turn Towards Nexogenous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connection [J]. Sociologia Ruralis, 2016, 56 (4): 552-573.
- [16] 乔天宇, 向静林.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 [J]. 学术月刊, 2022 (2): 131-139.
- [17] 胡卫卫, 卢玥宁. 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 (1): 133-143.
- [18] 文军. 打通内外的乡村内生发展模式探索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9-26 (7).
- [19] 文军, 刘雨航. 迈向新内生时代: 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 (5): 142-149.
- [20] 闫宇, 汪江华, 张玉坤. 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与拓展研究 [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7): 19-23.
- [21] 贺雪峰. 村治的逻辑: 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8.
- [22] 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第二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99.
- [23] TSAI L L. Cadres, Temple and Lineage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J]. The China Journal, 2002, 48: 1-27.
- [24] 孙秀林. 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 [J]. 社会学研究, 2011 (1): 133-166.
- [25] CHEN N. Rural Community Unbound: Trans-locality, Rural-to-Rural Connec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ter-regional Surname Associations in Chin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8: 378-386.
- [26] 托马斯·W. 李.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定性方法 [M]. 吕力,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53.
- [27] STRAUSS A L, CORBIN J M.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58.
- [28] 陆益龙. 百年中国农村发展的社会学回眸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7): 44-62.
- [29] 何慧丽, 许珍珍. 嵌入式动员: 党建引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43-51.
- [30] 王晓莉.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20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J]. 科学社会主义, 2019 (6): 123-129.
- [31] 张小军, 雷李洪. 乡村社区自主发展的中国经验——走向共同体的乡村自治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 (3): 99-107.
- [32] 何得桂, 武雪雁. 赋能型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有效实现方式——以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6): 134-144.
- [33] 向静林, 艾云. 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11): 4-23.
- [34] 邓燕华, 王颖异, 刘伟. 扶贫新机制: 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组织、运作与功能 [J]. 社会学研究, 2020 (6): 44-66.
- [35]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02.
- [36] 罗必良, 耿鹏鹏.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 基于人情关系维度的考察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10): 6-18.
- [37] 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M]. 冯钢, 刘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5.
- [38] 格兰诺维特. 镶嵌: 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M]. 罗家德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1.
- [39] 符平. “嵌入性”: 两种取向及其分歧 [J]. 社会学研究, 2009 (5): 141-164.
- [40] 林晓珊. 数字化转型与第二次消费革命——技术嵌入性作为分析范式 [J]. 新视野, 2022 (2): 115-121.
- [41] 李春生. 从技术应用到自动行政: 政府治理的技术想象及其脉络 [J]. 岳麓公共治理, 2024 (3): 14-25.

- [42] 徐旭初, 朱梅婕, 吴彬. 互动、信任与整合: 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机制——杭州市涝湖村案例研究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 (2): 16-33.
- [43] FORNEY J, EPINEY L. Governing Farmers Through Data? Digitiz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Autonomy in Agri-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5: 173-182.
- [44] 范炜烽, 白云腾. 何以破解“数字悬浮”: 基层数字治理的执行异化问题分析 [J]. 电子政务, 2023 (10): 59-70.
- [45] 李春生. 城市基层数字平台的悬浮化及其发生逻辑——基于 C 镇“智能码”平台的观察 [J]. 城市问题, 2023 (3): 71-79.
- [46] 湛礼珠, 张延龙, 马晓蕾. 悬浮推进、工具理性与数字乡村建设转型 [J]. 农村经济, 2023 (6): 1-10.
- [47] 宁晶, 宋泰彤, 严洁. 数字乡村建设能提高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吗?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实证研究 [J]. 岳麓公共治理, 2024 (3): 37-49.
- [48] TURKLE S.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279.
- [49] 杨江华, 杨思宇. 中国公民数字素养的概念测量与特征差异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 (9): 57-71.
- [50] 王进文. 农民主体性在场的乡村振兴事业: 经验局限与拓展进路 [J]. 理论月刊, 2020 (11): 51-60.

## How Is the Digital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Possible? —A 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WANG Mingyu<sup>1</sup>, PAN Weimin<sup>2</sup>

- (1. Department of Society and Ecology Teaching and Research, Party School of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 P. C. (Shanxi Academy of Governance), Taiyuan 030006,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blockchai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gradually changing the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in rural areas and driving the rural communities towards a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Neo-endogene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new guiding concept for rural development. Actors within rural areas take action, and local vitality is activate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methods such as top-down resource input, tools and means of middle-level social forces and bottom-up innovative actions. This study adopts the case study, and takes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Smart Governance Mini-Program in W Village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he digital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s possible. It is found that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al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can aggregate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values. Through th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mechanism, it can promote the quantitative governance and rule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providing villagers with a standardized, normalized and calculable platform. Through the social cohesion mechanism, it can adjust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digital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difficulties will arise such as digital suspension and cris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adres and masses, which need governors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path.

**Keywords:** digital governance;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